

从计划到数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演化的理论梳理

黄冠

(常州大学 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59)

摘要:为了明晰中国数字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遵循的制度原则,通过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次关键性调整,对当今中国经济走势和体制架构的成因做了探究;结合对不同经济增长驱动方式 and 经济活动组织模式差别的比较分析,推导了它们在中国经济演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从政府宏观调控着力点变化角度出发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实质,从而发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演化逻辑。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个基于已有的技术条件来不断调整政府计划 and 市场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分工的过程,并根据国内外经济情势调整不同的经济驱动模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建设是中国利用新技术变革应对国内外挑战,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期助力共同富裕并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的集中表现;数字基础设施全面铺设,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宏观调控的统筹协调水平,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实现经济双循环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经济演化;数字经济;理论梳理;模式比较分析;经济活动组织模式

中图分类号:F49;F01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1-0017-14

收稿日期:2023-1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SH044)

作者简介:黄冠(198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digital economy: a theoretical review of China's economic evolu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ANG Guan

(QU Qi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5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o elucidate the backdrop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construction, the pressing issues necessitating resolu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o be adhered to, this study undertook a review and categorization of pivotal adjustments in China's economy since the ince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rough this examinati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trend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in China were explored. Additionally, by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stinct methods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activity organization models, the study extrapolated their roles in shaping the trajectory of China's economic evolution, thereby unveiling the essen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evolution logic through the lens of evolving government macro-control focus. The research discerned tha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undamentally entail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recalibrating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the market's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based on prevailing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It involves adapting different economic driving models in response to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c dynamics to propel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pitomizes China's strategic utilization of novel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to addres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rectify structural issues accru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ste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endeavor aims to contribute to shared prosperity and bolster the sustainability of growth. By comprehensively deploy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hina seeks to elevate the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hance nationwid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y, efforts are directed towards bolstering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macro-control, facilitating the free flow and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foster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s dual-circulation dynamics.

Key words: China's economic evolution; digital economy; theoretical review; model comparative analysis; economic activity organization model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框架赋予了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管理的职能。政府直接负责安排生产、分配以及扩大再生产,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计划^[1]。在此体制下,政府不仅采用计划经济模式来组织全国的经济活动,也承担起运营国家各方面事务的全部责任,进而成就了党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担当的核心角色。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党和政府开始逐渐放宽对社会和经济的管控,特别是在产品分配这一领域,政府逐步撤除了直接管控,转而通过税收和其他福利转移手段来参与社会财富分配^[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有数字技术加持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获得了显著提升,中国也迎来了数字经济时代。

从生产角度看,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关键环节和领域实施管理,并利用统计数据来制定宏观经济规划、策略和法规,以此引导国民经济发展^[2]。在充分肯定市场在资源调配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依托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管理经济运行能力的提升,改进经济发展计划来克服以“调控的滞后性”为代表的市场失灵,进而在宏观层面上既前瞻性地促进经济增长,又稳妥地应对经济波动^[3]。在这一制度安排日渐完善之际,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革新的契机。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深入到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层面,针对中国经济数字化

转型升级的研究不断涌现。尤其是在“双循环”经济模式提出以后,社会各界对数字经济转型和中国经济演化实质的关注空前高涨,随之而来的争论也愈发剧烈。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数字经济转型为时代背景,展开了对中国经济制度各个相关领域的专门性研究,既有着力于税收制度改革,主张以税收治理替代税收管理,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4-6],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的研究^[7-8],也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展开的对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讨论^[9-10],更有为此展开的对城市建设和创新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11-13],并认定唯有以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为参照展开社会环境规划并调整人才培养方式和方案,才能驱动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学界对于数字经济建设所面临的难题和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影响,以及其与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契合性等宏观问题的不同侧面也有了一定的探讨,不仅总结了以数据资产保护不足、技术垄断泛化、技术接受度不足和关键技术缺失等关键问题,还提出了包括健全法规、出台激励政策和加大投入等专门性政策建议^[14],更进一步引出了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并认为继续推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依旧存在,而这正是解决当下经济发展和继续推进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需求不足问题的有效手段^[15]。

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了解析和认识数字经济及其对特定领域影响的重要资料,但是未能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走势

的整体性认知,更缺乏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成因探讨,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也缺乏必要的分析。缺乏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的、有可靠参照标的物的、对中国经济整体和本质的统一认识,正是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梳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对比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取得的成就、总结的经验、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数字经济转型带给中国的影响,随后对中国经济的本质形态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从而为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构建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转折

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数次显著转折,尽管保持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强有力调控,资源配置方式却实现了根本改变。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深,市场在资源调配中的基础地位得到确立。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蜕变过程的回顾和梳理,可以归纳出如下7个引导中国经济步入当今走势的关键转折。

(一) 商业管控松绑

这一举措的积极影响是,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资源分配的直接干涉。始于1978年,

中国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放在推动国家发展的首位,随之而来的是商业管制的相应放宽。这一时期,全国商品流通活力较之前有了质的飞跃,但是相关的商业管理法规更新滞后,导致个别人员利用制度缺陷和信息不对称进行寻租,政府采取举措打击这种形式的经济活动^[16],但并未能根本解决经济体系中的制度不完善问题^[17]。

(二) 经济特区创建

随着以市场为基础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区域性实践的开展,出口导向型产业崭露头角。这不仅为后来以“试点”模式验证经济政策可行性和成效树立了典范,也加剧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政府出于防范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和稳定经济的需要,转而开始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来释放改革信号,并在小范围摸索可行的改革模式^[18]。

“特区”和“试点”从此成为其他各行业和领域进行制度调整与改革时所遵循的范式。这种范式虽然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地域和行业间的发展差异。改革开放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客观上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经济领域的不均衡发展模式,而出口导向的“三来一补”产业培育也进一步固化了这种不均衡^[19]。

“三来一补”产业模式作为一些地区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工具,从发展伊始就确立了出口导向。这种产业模式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国际资本寻求利用资源价格差异和全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获取超额利润

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不仅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也未直接惠及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工业,反而使这些基础产业被动卷入了国际市场的动荡之中^[20]。虽然中国在当时确实需要借助外资和贸易来激发国内经济活力^[21],但这也给此后国内经济发展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埋下了可能遭遇国际经济起伏波及的潜在风险。

(三) 分税制改革和房地产崛起

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东部沿海区域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面临着更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压力,但是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未跟上整体经济扩展的节奏,致使中央财政陷入窘境^[19]。分税制的引进旨在翻转这种局面,通过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职能和经济资源,有效解决中央财政的收入短缺问题。分税制实施之后,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快速改善。与之相对的是,旧的“包干制”下的地方财政收入模式被打破,尽管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充地方财政的预期,但实际操作中缺乏对于转移支付条件和数额的具体与可操作性的界定。再加上中央和地方职责划分的相关改革滞后,地方财政的收支出现错配,这迫使地方政府寻求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形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依赖土地出让和债务融资的情形。

在地方财政增收、削减居民可支配收入以避免经济过热和满足居住市场需求等多方合力作用下,房地产业快速兴起。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在经济特区内,土

地交易失范,市场陷于混乱,部分时段的投资回报率甚至飙升至500%^[22]。尽管有过市场调控尝试,自1997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以来,住房开发被确立为新经济增长点,土地出让和由此衍生的举债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日益增加。随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驱动战略扩展及房地产的蓬勃发展,刚起步改革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能提供经济增长所需原材料的国企经营状况相应地出现好转。尽管这些国企运营也受到外向型经济的影响,被动增长的营收却也掩盖了它们内部管理上的问题。这些矛盾逐渐积累,致使后续国企改革的紧迫性被不断推高。

(四)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随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成为经济飞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国内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部分富裕起来的民众在满足其消费需求之后,面对有限的资产增值途径,逐渐将目光转向房地产市场。随着全球市场对中国的日益开放,与出口密切相关的行业经历了迅猛增长^[23],这不仅助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强化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并进一步放大了经济结构的不均衡。

加入WTO引发的经济浪潮过于迅速,未给政府及整个经济体系留下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早期发展阶段中存留的个别不平等问题。面对快速膨胀的经济体量,率先富裕起来的民众对于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追求变得更加迫切,然而当时缺乏成熟有

效的资产保值增值渠道^[24]。在这种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与政府将房地产确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政策不谋而合。房地产行业在普通民众的居住需求被满足之前,便急转成为热门的投资产品,致使房地产行业运行与中国经济走势进一步绑定。随着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逐渐超越劳动回报率,收入差距现象被强化。

(五) 转型期遭遇“次贷危机”

在出口导向型发展进入瓶颈,中国开始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严重破坏了全球经济运行环境的稳定。为应对外部危机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冲击,大量脱离“三来一补”产业的资金流入金融投资领域,以支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计划。该举措一方面使得个别落后产能继续存在,甚至迎来产能扩张^[25];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可能透支了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手段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效能。加之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职责重新界定尚未完成,个别地方政府陷入了土地财政和地方债的泥沼,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进展缓慢。

以出口导向型产业驱动经济发展遭遇瓶颈的根本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出口导向型产业能够带给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租金”逐步降低。在人力成本逐步攀升的情况下,要保持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以及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迫切需要。

“四万亿”救助计划对当时的经济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以土地出让金为抵押的地方债务规模,同时,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角色不断强化,逐步成为支撑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口导向型产业和房地产业已然变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26]。

(六) “腾笼换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增长由粗放的资源投入转变为资本流动的引导,金融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尽管政府制订了旨在对外输出中国经济中过剩产能的发展战略,但受到国内金融波动和国际上排斥中国的新关贸体系成形等因素的影响,产能输出计划未能取得迅速进展。这一延迟触发了包括产业升级、收入分配和资源利用等在内的一些问题,使得中国经济改革来到了深水区。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基建产能和制造业产能寻找到了出口,而亚投行的创立提供了原始动力^[27]。然而,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够成熟延缓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导致充裕供给的人民币难以在短时间内流入他国,与之相伴的国际汇率波动也拖累整体规划的落地。同时,在全球经济贸易环境趋于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制造的产品对于国际买家的价格优势逐渐减弱,同时中国经济结构中供外资企业利用以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已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快速壮大,主要是通过从其他行业转移收益实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整体的经济运行效率,但其盈利大多来自于对其他领域产生的租金效应,并未实质上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做法不但给传统行业带来了额外的经营压力,还影响了产业的整体升级。在中国的经济架构中,互联网企业多扮演着利益分配的角色,而不是实际的生产者。即使互联网行业需要通过削弱传统行业盈利而快速成长,但是它在推动国家经济效率提升及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实际作用仍有待提升。面对这样复杂的内外挑战,资本方面缺少强劲的市场需求来支撑生产和实施产业升级。

(七)数字经济转型

稳定的产出为中国经济赢得了进一步改革的时间窗口,“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提出预示着党和政府开始集中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与此同时,得益于数字技术进步,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以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化治理工具创设,以及数字技术逐渐渗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技术基础,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2020年,中国稳定的经济产能维系了全球消费品供给,并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赢得了窗口期。共同富裕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进一步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28]。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高和收入差距是制约内需增长和影响居民消费力的症结,以

共同富裕为目标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将带来经济可持续的良性内循环,也会成为经济产业升级的内生驱动。“三道红线”的划定,是兑现“房住不炒”的关键措施,也是调整房地产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推动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的关键步骤。此外,以整顿教培行业为起始,政府开始遏制互联网行业的盲目扩张,引导数字技术应用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向转型。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建设在中国全面铺开,一方面要发挥其作为革新性技术提高效率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依托其作为基础性技术的特质,逐步重构整个经济体系、运行逻辑和节奏。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依托信息技术应用来提高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效率,提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要推动经济生产向高技术附加值产品转型升级,利用数字技术支撑中国同传统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生产国的竞争^[29]。更进一步,基于数字技术的政策工具设计和基础制度架设,可以显著提高政府收集和处理经济信息的效率和能力,这将显著改进经济发展规划的质量和宏观调控效果,实现中国对经济运行发展的数字化治理。与中国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全面铺开相伴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阵痛及运行波动,均需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予以及时解决。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演变的理论探讨

通过评估中国经济在各个关键发展时

刻的方向性、积极成果及沉淀的挑战,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探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以驱动经济增长的主题模式差异为基准,独立的经济实体的成长模式主要可以分为“消费驱动型”和“投资驱动型”。在“消费驱动型”模式中,消费者的需求直接引领生产,在生产和加工阶段开始之前,消费市场的需求已明确存在。这种模式保证生产过程由实际需求直接拉动,使得资源的配置能够在生产流程中得以准确预测,资源的数量和定价都较为稳定,因而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存在的“寻租”空间相对较少,资源使用效率也比较高^[30]。而“投资驱动型”模式,是依赖投资来增加生产量,并寄希望于生产本身能够激发需求。在这一模式中,由于缺少先行的确定性需求,在配置资源时会频繁遭遇量价层面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中“租金”现象增多,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31]。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很少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完全基于单一模式,通常情况下只是某种模式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另外,有一些国家在选择其经济增长方式时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对其增长策略产生影响。二战结束后,在重塑经济的抉择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线利用战后重建的有利环境,在西方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下,经济迅速恢复并实现了显著增长^[32]。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被西方学界诠释为“投资驱动

型”^[33]。虽然通过对苏联历史经济的分析,发现其符合“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特点,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限于苏联当时技术条件的合理决断。苏联模式并不等于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更不代表社会主义经济就等同于“投资驱动型”增长。实际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投资驱动型”增长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以中国的发展为例,改革开放初期,内部市场尚未发展到足以驱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程度,外来资本的涌入开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路^[34]。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是中国较低的投资成本和相应的较高利润。随着以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在实践层面助长了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投入的依赖。与消费需求驱动经济成长模式中潜伏的有效需求不足风险相比,资源投入型的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枯竭风险更大。虽然前者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来适应和驱动消费升级,但是后者在根本上削弱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依赖资源投入的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此外,中国面临的另一关键问题是,海外市场竞争加剧,欧美买家以“去风险”为遮掩推动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造成对中国产品的海外有效需求减弱,而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体量短时间内又不足以推动产业升级。要更深入解读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层面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成因和

演化做出进一步探讨。

二战后渐成主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强调按照全球市场的需求来配置产业资源,其国际市场需求成为这一模式下经济体组织生产的主导动力^[35]。与这种紧贴国际需求且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安排伴生的,往往是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迁移。从上述概述中可以发现,出口导向型经济依赖全球市场,其自主调控能力相对较弱。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催生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兴起,全球市场的动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类经济体的表现。同时,从发达国家迁出的产业往往技术附加值较低,在完成产业升级之前,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也没有能力独立开发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多处于中下游^[35]。

外资和国际市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同时海外转入中国的产能和需求又主要集中于低附加值产业,其嫁接的技术也同当时中国的产业技术差距不大,不可能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提供充分动力。随着资源投入型增长方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下降,以及中国技术实力的积累,抓住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转型机遇,中国不仅迅速开展了在高技术附加值产业的布局,而且发挥决策成本较低的制度优势,展开了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制度建设,从而推动中国全面进入数字经济建设阶段,以期提

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次,摆脱对投入型增长的依赖,转而依托数字技术带来的整体生产力上升来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数字技术是兑现社会主义经济运营职能的必需

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和走向,仅梳理演化历程和分析经济形态并不够,还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指引中国经济发展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理念。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曾因其意识形态属性而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各界开始明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仅仅是经济运作的不同组织形式,都发挥着工具性的作用。计划经济的设定原意在于解决市场经济中自由市场调节滞后和潜在的资源浪费问题,它试图通过放宽对经济分配效率的苛求,以期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减少资源的损耗和浪费。

计划经济是一种理论层面的理想的经济组织模式,它的效率和效果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假设基础之上。这些假设包括,在规划者可以无成本地、即时获得和处理所有经济活动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所制定的计划是合理的、有效的且能够洞察未来的。这种几乎等同于存在着全知全能的经济计划制定者的假设,在实践中几乎难以实现,致使各国在实践中仍需借助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的基本配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因为技术限制而完全否认计划经济的价值,苏联的某些成就以及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情方

面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潜力。

计划经济作为马克思描绘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实践与理论设想间出现的偏差源于理想的社会主义是假定在生产力极其发达且资源极为丰富之后才会到来。学界已有的论述多强调推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前提,而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基础经济条件。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产品的极大丰富”,即资源稀缺已被消除的基础上的。资源稀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分析的出发点,然而马克思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设定的出发点却超越了资源稀缺。认识到这一差别,就能理解为何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经济发展的解读方面存在本质差别^[36]。

从这个视角审视,可以看出苏联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实际上是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使用公共权力主导资源分配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并保障社会成员能够在基本平等的生活条件下追求个人的发展。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民众生活水平并未出现显著提升,以及苏联经济体制难以为继的原因。此外,虽然计划经济在集中资源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确有优势,但是也过于依赖决策指导。

数字技术的进步在理论层面使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数据的能力获得空前加强,而收集和处理信息数据的资源消耗和时间成

本却不断降低,这无疑提升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和功效。计划——作为一种经济管理工具,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不必继续扮演纠正“市场失灵”的补充角色,而可能在更为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其领导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实践层面,要实现数字技术对政府调控和引导经济运营发展的预期,不仅需要加强数字技术在经济运行全过程的应用,更需要政府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重新构架和设计整个经济运行的制度逻辑,并及时完善配套的政策工具,为数字经济的实现准备好制度基础设施。

四、从分配到供给: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及其政策建议

通过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工作重心的解析,不仅明确了计划经济着力于分配领域的原因和影响,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有了新的理解。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政府逐步撤出分配领域的过程。然而,政府在分配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并且资源定价中的差别化机制依然存在。这些与西方经济模式不吻合的特质,使得基于西方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所设计的宏观经济调控规划,在中国的实际运用效果并不理想,有时甚至与预期目标相违背。

经济改革过程中,不仅在摒弃旧有体系中的“租金”,也在对各个行业的“租金”进行重新分配。这个深刻转变恰好与数字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重叠,又与中国

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向技术革新驱动的转变交织在一起。新技术的介入加速了原先渐进式的“租金”剥夺与再分配的过程,并使这一调整在转型期间的难度加大。新兴产业借助数字技术优势迅速吞噬传统行业的“租金”,并依靠庞大的资本积累,配合金融业在经济结构中日益提升的地位,迅速获得巨大的市场影响力。

中国经济独特的发展模式,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相互叠加,既提供了发展的历史机遇,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个别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的压力下,难以在短时间内清除经济中的一些泡沫;另一方面,长期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基建投资,其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已存在一定程度的弱化。对这些问题的综合考察,可以揭示经济结构性矛盾,也明晰了未来经济调整和政策制定所需考量的背景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37],以数字经济转型升级为途径,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强调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提出“共同富裕”,以期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内循环,通过扩大内需来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内生动力,从而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国内国外的经济双循环。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增长方式的转型,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不仅着力解决前面积累下的经济运行的各种问题,还迎来了增长方式转型的数

字经济升级。二者的叠加,放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波动,加之欧美发达经济体以“去风险”为遮掩推动国际产能重新布局,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外部环境。要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加强政府经济领导能力,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就需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政府真正做好制度、政策和法规的供给,在资源配置和产品分配及消费中实现计划和市场的良性组合,具体来说要做好以下3点。

第一,加强对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数字化基建投资,以此来降低不同区域之间经济互动壁垒,便利产业布局的跨地域调整。区域发展不平衡既是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也隐含着整体经济提升的空间。目前,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形势迫切,若将传统产业搬迁至中部或西部未充分开发地区,则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阶梯。这不仅提升了经济一体化水平,也可在产业升级的同时保障既有经济布局的平稳调整。未充分开发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是实现产业平稳转移的基础,该水平的提升不但可以克服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壁垒,还能增强政府对国家经济的调控能力,并且为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开辟新的出路。

第二,需要调整中央财政刺激经济的手法,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应调整基建在经济调控中的比重,改为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推动服务业的增长。借此,活跃的商业活动税收可以平衡地方政府财政中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部分,为地方政府跳出土地财

政的困境铺平道路。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的转移支付,不仅能够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还能释放消费者的购买力,将消费能力转化为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需求侧动力。此外,商业活动的繁荣也会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通过释放消费能力来逐步解决先前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积压问题,同时借助新税源的出现,使地方政府有能力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第三,依托数字技术进步,中央政府一方面需要强化对全国公共事业的综合规划与管理,另一方面适当增加中央财政的支出比重,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为其逐步脱离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创造条件。在公共基础服务方面,应当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全国范围的统筹协调水平,缩小不同地区在基础制度保障方面的待遇差异,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消除经济中存在的“租金”过高问题,并减少落后产业的利润空间,倒逼产业升级。同时,减少跨地区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技術障碍,以支持更高效和平衡的发展格局,并进一步挤压落后产能的生存空间,用竞争促进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

五、结语

本文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历次关键调整及其后续影响进行概述和分析,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演变背后的动因以及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和差异,这对于发掘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逻辑,总结当下和未来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而明

晰数字经济建设对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本文依托综述性研究方法,并结合比较分析,创新性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当今走势的成因和不同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差异,但限于篇幅,本研究的论述也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不同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测算,以便对当前中国经济调整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做出更好的判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各个关键时期的评测与阶段划分的研究还不深入,已有的研究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全面梳理,虽然本研究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次关键调整可被视为进行阶段划分的参照,但是也未能深入地对各阶段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必要的量化分析。上述两方面的缺失将成为我们在后续研究中重点攻关的难题,以期为学界发掘解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并提供数字经济建设发展的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1] 赵凌云. 1949—2008 年间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演变与转变的内生逻辑[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9(3): 24-33.
- [2]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1999.
- [3] 杜进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越两国经济改革比较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 [4] 杨世鉴.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税制改革: 从税收管理到税收治理[J]. 当代经济管理, 2023

- (4):77-82.
- [5] 王卫军,朱长胜. 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从生产增值税到消费生产税[J]. 税务研究,2020(12):61-67.
- [6] 张斌. 数字经济对税收的影响:挑战与机遇[J]. 国际税收,2016(6):30-32.
- [7] 薛阳,胡丽娜. 关于税制改革赋能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若干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11):1729-1739.
- [8] 解垚,孟婷. 数字经济、税收努力与税收增长[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12):3-15.
- [9] 唐雯,林益忠. 数字经济背景下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数智化”改革——以工商管理专业为例[J]. 嘉兴学院学报,2023(6):131-136.
- [10] 张为付,张晓磊,姚飞. “互联网+”商业模式变革背景下的新商科人才培养[J].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5):5-9.
- [11] 郑冰,赵彦云,吕凯波.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效应与机制[J]. 经济问题探索,2023(11):20-36.
- [12] 袁航,朱承亮. 智慧城市是否加速了城市创新?[J]. 中国软科学,2020(12):75-83.
- [13] 韩先锋,宋文飞,李勃昕. 互联网能成为中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新动能吗[J]. 中国工业经济,2019(7):119-136.
- [14] 王艳. 数字经济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 今日财富(中国知识产权),2023(2):89-91.
- [15] 余永定. 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几点思考[J]. 管理现代化,2023(5):1-9.
- [16] 李德彬.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17] 保建云. 论中国经济转型期权力租金来源与控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2):3-9.
- [18] 周望. 中国“政策试点”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2012.
- [19] 陈庆. 我国沿海加工贸易集群的转型升级研究[D]. 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3.
- [20] 李凌. 要素商贸条件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影响分析[J]. 商业时代,2014(29):35-37.
- [21]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2] 宫汝凯. 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城镇房价水平[J]. 金融研究,2012(8):70-83.
- [23] 齐志强,张干,齐建国. 进入WTO前后中国制造业部门结构演变研究——基于制造业部门与工业整体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2):52-63.
- [24] 盛文,王芳. 论房地产保值增值的本质[J]. 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10):136-137.
- [25] 刘立峰. 4万亿投资计划回顾与评价[J]. 中国投资,2012(12):35-38.
- [26] 黄干,马成. “4万亿”的经济效应与财政投资结构优化——基于CGE建模的分析[J]. 经济学家,2012(10):71-80.
- [27] 王达. 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J]. 东北亚论坛,2015(3):48-64.
- [28] 杜喆,赵金科. 习近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J]. 学术探索,2023(9):19-24.
- [29] 刘军,杨渊鋈,张三峰.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20(6):

- 81-96.
- [30] 林贤郁.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J]. 统计研究, 2007(3):3-12.
- [31] 陈漓高. “增加投入型的增长”的历史、现实与未来[J]. 世界经济, 1996(4):5-10.
- [32] 李雪斌. 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J]. 长白学刊, 2000(2):28-29.
- [33] 程又中. 苏联模式的形成、僵化及其教训[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0.
- [34] 林民书, 杨治国. 外来投资对我国企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佛山、东莞、深圳不同引资模式的比较为例[J]. 河南社会科学, 2006(3):11-16.
- [35] 赵陵, 宋少华, 宋泓明. 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 2001(8):14-20.
- [36] WOLFF R D, RESNICK S A. Economics: marxian versus neoclassical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7] 邱海平. 系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 光明日报, 2021-07-13(1).

(责任编辑:杨南熙)